
* 双柏县文史资料选辑 *
* *****

第 八 期



- 一、一贯道在楚雄地区的起源与灭亡.....王文俊
二、鄂加“界牌烟”.....杨光辉
三、双柏彝族风俗之一.....鲁忠良
四、民国初年双柏县行政区域.....徐焕章
五、民国时期封建地主和豪绅在双柏的统治.....郎秀才
六、征稿启事

一九八八年九月

“一贯道”在楚雄地区的起源与灭亡

王 文 俊

一贯道，又名孔孟道，是一个以孔孟理论为外衣，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图谋反革命的反动组织。我因工作需要参与了对双柏以至楚雄地区的“一贯道”的侦破工作，因此，对其在楚雄地区的产生、发展、灭亡等经过以及组织发展、活动方式等有一些了解，现将它回忆整理出来，供知情同人商榷。

一九四六年初，一贯道的四川雅安、西昌据点派遣“全人”级点传师李××（名已记不清），以雅安××堆店大老板的身份来到楚雄鹿城，以行商为掩护，有计划地选择据点，发展组织，所选发展对象一般是年龄四十岁左右，在社会各界有一定影响，个人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沉浮之人。李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明查暗访，在楚雄地区发展了李松岩、李开先、谢同春等人，在李松岩家设立了楚雄地区第一个一贯道“佛堂”。从此，“一贯道”如毒疮溃烂，很快就在楚雄地区蔓延开来。

佛堂设立起来后，“李老板”等以此为据点，亲自带领李、宋、谢、等人，以行商为名，分期分批，多次到雅安、西昌、会理、德昌等地的一贯道总分堂号接受培训，参与当地“点传收徒”、“讲经朝拜”、“显灵扶乩”、“行功消灾”、“佛祖显圣”及“立堂盛典”等各种活动，并得到一贯道四川堂弓长祖师爷的认可，此后，李松岩为首的骨干在楚雄城设立了县级总堂，直接接受雅安地区总堂管辖，一切堂训往来，财物

解缴，人员调派，全由雅安总堂指挥。

一九四七年，一贯道云南总堂在昆明建立，据说仍隶属于四川成都佛祖级全人领导，虽然当时弓长佛祖已经过世，但成都总堂仍用其发号施令，拢络道徒，于是，鹿城县级总堂也随之晋升为地区级总堂，办事机构设于鹿城北郊上章村。后来，又按鹿城方位设置了东、西、南、北四个分号总堂，作为上章村地区级总堂的派出机构。其辖区分别为：

东号堂，设于鹿城东门街，管辖饱满、腰站两乡及广通、禄丰等县。

西号堂，设于米市街北侧小街，管辖吕合、南华、姚安、大姚等地。

南号堂设于铜店街，管辖东华、子午、双柏等地。

北号堂设于北门街，管辖牟定、元谋、永仁等县。

分号堂设置后，主要是向各辖地区收徒设堂，收取“行动”，首先是选派与各方有亲缘或其它社会关系的全人、点传师、堂主、道徒等，深入到各地勾通联络，发展道徒，组织善男信女设立家庭佛堂，并施出其看家本领——“佛祖显圣”、扩大影响，迷惑百姓。致使一贯道组织在楚雄地区一哄而起，几乎城镇附近的每个村都设起了一个或几个家庭佛堂。这里所谓“佛祖显圣”，其实是一种骗术，一般在夜间进行，先由主持全人带领各级点传师、堂主、道徒及特请参加者（计划点传的道徒）进行百叩、千叩、祈求佛祖大慈大悲，消灾免难，光临‘显圣’，如此反复多次，叩得群人头晕目眩，这时，只见参与叩拜的“乩手”眼闭身摇，故作姿态，以示佛祖接受显灵，掌堂全人趁机大呼“接驾”，满堂众人急忙叩头祈祷，扶乩全人起身将佛祖替身（乩手）扶至佛台站立，交付显圣乩架（木制，也有竹制圆形），“乩手”手持圆形乩架，前后左右摇动，使

乩架上的木笔在下面的沙盘里划出横行字迹，扶乩者手拿刮板，一面按全人事先的授意高声宣读“乩文”，一面将沙盘上的字迹刮去，记录的点传师按扶乩的呼报记下后再向众人呼报，如此反复表演至所需内容记录完毕时，乩手则发出行乩信号——站立不稳，东倒西歪，扶乩者立即高呼“恭送佛祖”，众人又是千叩万叩。经全人整理，一份号称“××佛祖显圣堂训”就此出台。这种“堂训”不但蒙骗了在场的善男信女，而且传抄散发，作为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工具，通过它将想干的事都付诸言以“堂训”名誉。带上神话色彩在人们中间广为传播。

其实，乩手、扶乩及记录的点传师等，都是经过地区级以上总堂严格挑选和训练过的，每次“显圣”前都由掌堂全人密秘授意，将他们的愿望及论调贯穿于老套堂训中，文辞晦涩，似是而非，牵强附会，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神秘感，凭着这一骗人的法宝，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行动计划及应变方针。这种骗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很不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受骗入道者越来越多，家庭佛堂纷纷设立。到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下令取缔前夕，一贯道组织机构已遍布我州各县镇，部份地区已发展到广大农村，不仅设置了完备的组织体系，而且组成了应变能力比较强的通讯联络网和地下活动堡垒，培植了一大批职业办道人，建立了自下而上的财务收缴及文件保存制度，大有与中国共产党一决高低的势头。因此，当时有人说：那一贯道就算得上第二天党了。
“若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那一贯道就算得上第二天党了}然而，靠欺骗群众为手段发展起来的一贯道，只不过是道头们一个短命的梦，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日益觉醒，一贯道组织的本质面目很快暴露出来，终于被历史所淘汰。作为历史，一贯道虽是短命的，但就其组织体系及其发展速度而言，

确实是很惊人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下面我就双柏县一贯道从产生到灭亡的情况尽我所知，作点回忆：

一、发展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一贯道起初是在中层人士中寻找代理人，一九四七年一贯道“守信总堂”在原双柏县城内的大地主姚子斌家设立，王凤英为“点传师”，姚子斌、姚玉芝、姚钰等为道徒，此后又发展了几处分堂，一九四八年，“守信总堂”晋升为县级总堂，隶属于楚雄铜店南号总堂管辖，下辖双柏县及楚雄县的大、小两裱（今子午，东华两乡）分堂，一九四九年未和平解放前夕转入地下，迁往大裱兴村。据后来缴获的该堂收到的最后文件——《百效丹》堂训内容以及部份点传师的口供，说明在解放后的两年间，相当于共产党西南军政委员会一级的一贯道西南区总堂在成都成立后转入地下，向西南地区各堂号发号施令，下达《百效丹》堂训，要求所有总分堂号转入地下活动，发展和建立与当地行政区相应的佛堂，与共产党的县、区、乡、村等行政组织相对应。因此，双柏的云龙、妥甸、法裱、大庄、格拉、麦地新等地，组建了各种佛堂，并将各佛堂下属的男、女、老、少（最小的有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道徒划分为“智”、“仁”、“勇”三类，编成小组，由家庭佛堂堂主任组长，编造成册。工作之细是很惊人的。

此外，转入隐蔽活动的佛堂，已不象初起时那样摆设的富丽堂皇了，与一般农户的堂屋一模一样，只有本堂道徒才知堂户。发展的道徒也全面扩大，从小有产者到贫雇农，拉得进去的都尽量拉，企图与中国共产党争力量，达到其推翻新生人民政权之目的。

二、建立灵敏的通讯网及堡垒窝藏系统。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我县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开始后，县委、县人民政府派我参与此项工作。当时，守信总堂已转入地下，且经营多年，职业办道者就达十四人之多，其中全人级八人，点传师级六人，受其统领的道徒达数千人，关系复杂，窝点较多，要取缔有一定难度。对此，我们先从缉捕办道人入手，抓其首领，一举取缔，但由于他们建立了比较灵敏的通讯网和窝藏堡垒，连农协会成员中也混进了他们^的道徒，因而多次追踪都落了空。

经过认真分析，我们改变了工作方法，对露面的小堂主进行分析排队，组织专攻小组有重点地进行跟踪侦察。经多次侦察，终于找到了线索，在云龙与窝碑的小赖坡右侧深山老林的炭窑附近，有人活动，于是我们连夜摸到该地。炭窑附近的土屋，捉住了全人级职业道头姚子斌及杨××，不料相陪过夜的窝藏户主李××逃掉了，在我们追踪时，他跑到另一个堡垒户，如此传送，直至一年后才在禄丰被捕捉归案。我们在每格郎村调查得知，李××是该村农协组长，又是一贯道堂主，负责两个窝藏点，逮捕了姚杨两个道头，各路“老保”如惊弓之鸟，争相逃避，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加紧侦察，得知双柏城西下邑村李××，是一贯道联络员，他可能知道总堂主王凤英的下落，于是我们拘留了李××，进行多次政策攻心，但全无效果。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不得不作了如实交待。有一天，我们在广播室内收听广播（双柏县第一台收音机）时，传讯了李××，只见他看见收音机，并听到其中有人讲话，就惊慌失措，万分惊恐，我们将计就计、关掉收音机，对他说，我们用这个机器进行了侦察，现已查到了王凤英的踪迹，现在传讯你，是给你最后坦白的机会，如果你交代的与我们用机器侦

察到的一样，就算你老实，给予从宽处理。否则，就按抗拒论处，罪上加罪。何去何从，由你选择。他听后犹豫多时，最后才如实交待了王凤英的隐藏地点说“据我三、四天前所知，她躲在子午地区的甸尾村×××家，这两天是否有变动就不知通了。”我们认为其交待属实，当夜十一点左右赶到甸尾村，找到窝藏点是一个贫农老妇的家，当我们问及王凤英时，她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失口否认。我们分析了一贯道道徒的情况，认为王犯定在此村。此时，虽已深更半夜，追捕王犯的消息已传遍全村，人们纷纷涌进老妇家中，我们便将老妇带到该村稻场，借着朦胧的月光向群众交待党的政策，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实质，最后宣布，我们认定王凤英就在村中，今夜若不将她交出，就要逮捕老妇人及其他窝藏嫌疑。这时，人群有来有往，但保持沉默，近凌晨五点，仍无动静，我们再一次交待：若天亮还不交出王犯，我们就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加重判罪。在强大的压力面前，王凤英终于从几名道徒中走了出来，我们将其押解回县城。

三、骗钱财以饱私囊

从收缴的文件资料及管财点传师刘××的交待看，一贯道不但有一套组织体系，而且建立了一套自下而上的理财制度，从这点上看，一贯道也不是一般的封建迷信组织，在经济上不象一般民间的迷信活动那样收取“功德”，各占一方，互不干涉，而是有统一的财源及收支规定，查其财务资料得知，一贯道在当时主要有两大财源：一是“点道费”即入道时，无论男女老少，受骗入道时人人都必须缴纳伍角或元，此项人头费全部上解总堂，据记载，仅我县被其骗取的点道费就有数千元之多二是“行功”，所谓行功，就是说你前生造了孽，有罪有债，要你今世出钱消灾，佛堂就

是帮你还债消灾的地方，只要你向佛堂交了钱，就可以免除灾星，吉庆平安，否则将大祸临头，门庭遭殃；至于出多出少，名曰：“随心自便”，然而“心诚则灵”，诚者多也，越出得多就越消灾，实质上，利用这种办法向道徒多收“行功”，所收“行功”部分^留作各级“佛堂”的“香火”钱，其余向各级总堂上解，用其在大中城市开设商号，既可发财，又可作为联络据点。

由此可见，一贯道通过精神麻痹，不但将道徒控制在其组织体系内，而且从经济上掠夺还要使其自觉自愿，不敢不出钱。

四、笼络人才，培养职业办道人

一贯道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道头们确实有些精明，在点传道徒时，除唯利者是点传^者外，还很注意点传那些有一定学识，较精明强干的中青年为党羽，在他们中间培植代理人，就双柏来说，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中，就有十四人入道，大部份培养成为职业办道者。此外，道头们还在各个领域内搜罗人才，送到雅安，成都等总堂培训，有的留在总堂办道，有的担负了楚雄总堂的全能“显圣”乩手，有的被派往县内基层佛堂培植堂主、堡垒户、联络员等。真可谓处心极虑。

五、“天命”保不了“天神”

如前所说，一贯道利用“显圣堂训”，“行功”等手段欺骗民群，其目的在于实施他们的反革命应变计划，但这些“天神”们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他们的狐狸尾巴，正当他们洋洋得意地在“天命”招牌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他们的美梦，人民政府下令取缔一贯道，这些以天神自居的“善男信女”躲的躲，逃的逃，“天命”、“神法”失

灵了，最后不得不束手就擒，认罪伏法。取缔了“守信总堂”，逮捕了王凤英及其同伙后，我们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破获了大批埋藏的文件材料，有各级总堂的“显圣堂训”，各佛堂所辖“智、仁、勇”小组名册以及财务账目等，我们靠党的英明政策发动和教育人民群众，取缔了靠“天命”欺骗人民的一贯道组织，保证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谎言欺骗不了现实。

鄂加“界牌烟”

李世昌（新平） 朱超（双柏） 尹正荣（双柏）口述

杨光辉记录整理

吸旱烟（老草烟），实为嗜好，在^群众生活中却少不了它，山区、民族地区群众更为常见。乾隆鄂加志（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一年）物产货属中即有烟叶记载，其历史之悠久，由此可见。

“界牌烟”以产地鄂加界牌而得名，“界牌”系双柏、新平两县分界的一个山区小集市，集市上有大青树（有说为核桃树）一株，两县以此为分界点，“界牌”今为鄂加乡新街村公所驻地，集市人口不多，每逢街期，两县边缘群众在此进行经济交易活动。“界牌烟”产于“界牌”附近两县的部份地区，所产烟叶，以其色润、香味、冲气适中，无苦酸异味，品质优良而著称。有清痰、平喘、止咳、除痒消毒之功能。群众称“界牌烟”为“和气草”，历史上有双柏、新平人走“夷方”（今泰国缅甸一带）以其气候炎热，病害频繁，必带“界牌烟”以防患于未然，即远于此。

“界牌烟”生产于新平县大、小鹅毛（新平人又称“界牌烟”为鹅毛烟）白虎坟、菠萝村、二坟、大、小竹箐；双柏县的石头村、大梁子、大龙潭、瓦房坟、核桃箐、四眼井村等地。其品种分大柳叶、二柳叶、大附耳朵三种，以惊蛰育苗，立夏、小满移栽为最佳节令，适宜于海拔1500至1800公尺以下的红沙胶泥生地土壤地带，打坟施底肥，适时再

施追肥，以后视烟株留叶，及时封顶，一般于旧历七月十五日前后采摘头刀烟，十月采摘二刀烟，亩产可达250市斤。两县适栽地区，年种植面积四百余亩，总产烟叶十万余斤，斤价半开（银元）一元左右，畅销新平、鄂加，远销景东各地，为两县边民群众经济来源之一，收入最多的户，年达半开五千余元。

双柏彝族风俗简介之一

双柏彝族有许多好的风俗习惯。这些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审美观点和道德规范，包含着丰富朴素的精神文明内容。

一是文明礼貌。彝族是一个讲究礼貌的民族，尊敬老人、孝敬双亲、亲密和睦是传统美德之一。路上遇^见老人主动让路，村里谁家办喜事和节日，要敬请老人坐上席，村里那位老人生病或去世，村里各家都送厚礼看望和哀悼送终以表怀念。男儿结婚时，先请老人和双亲受拜，则感谢抚养自己成人，二则祝老人吉祥长寿。调解公务矛盾要征求老人的意见，评理调解；与他乡交涉民事，要请老人出谋献策。人们从小知礼达义，虐待老人极少发生，兄弟妯娌，婆媳亲密无间，相敬如宾，邻家经常争吵打架，村里老人就说服教育，彝族又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来客不论远近亲疏，一律递烟倒茶，酒肉相待和同桌陪送。青年人既热情活泼，又规矩严谨，他们坐有坐样，站有站相，姿态端正，双手抱膝，行为决不粗鲁，指手划脚，正因如此，彝族村寨常呈现一派安定团结、亲密相处的景象。

二是团结互助。彝族历来有集体主义精神。一人有事，众人帮忙，一家遭难，邻里相助，一方遭灾，他乡支援，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百家帮忙。如遇天灾人祸，众人伸手重建家园，村里出现鳏寡孤独，则轮流照顾，如有自私、事不关己者，将众叛亲离。彝家逢年过节，传统节日，男女老少可尽情娱乐，素不相识，能尽情歌唱，众多场合，但很少有怪事发生。

三是热心公益。彝族以助人为乐的美德著称，如彝乡古道的风雨桥、

青石板路是彝乡的特色，路面平整、干净，路口有指路牌，这些公益均有专人维护管理。彝山的风雨桥，结构精巧，坚固耐久，它是彝族人民长年节衣缩食捐功献料共同劳动的结晶。历史上不少村寨划定一份田地，用来维护这些公益事业，如六街至新街途中的“小水槽”从一公外^里引水，供应通商民众之用，这份田由木喜郎村收租来维护小水槽长年清水常流。

四是植树造林。森林是彝家生产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对森林倍加爱护。保护风景树，水源林是彝家不成文的规矩，所以大多彝乡村寨都有一古树衬托。彝山村寨平行的山腰要位种有成线相距的标志树，群众称它为传递情报的信号树。有什么风吹草动，人们在树上出示标记传递信息，便于防范。植树造林的习俗使彝山绿树常青，碧水常流。解放初期直到六十年代，从法甸到浪泥一带，非常明显，（后遭破坏）植树造林是一民间宝经。在我县森林资源屡遭破坏，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的今天，更值得提倡。

五是制定乡规民约。是彝家人民自我教育和管理的好方法。乡规民约一经制定，就形成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寨内不分民族，阶层人士都得遵照执行。而今还^颂传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和“非我不取”的传统道德观念。彝族有家族间的管理条例，族中谁违犯族规，集众严教制裁，所以彝族群众一般能安份守纪。

六是移风易俗。双柏彝族是一个富有改革精神的民族。当他们意识到一些陈规陋习，制约民族进步，影响身心健康，便自觉地改掉旧习俗，发扬新风尚，使自己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新生活的需要。彝山的婚礼丧葬曾多次改革，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如今不再是彝家的精神负担，迷信职业者在

彝山一般是不能立足的。这些优良的习俗，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研究借鉴彝族进步、健康的风俗习惯，对我们今天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发展民族关系，进行法制教育，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是有积极重要意义的。

双柏县民委 鲁忠良

天

民国初年双柏县行政区域

徐 焕 章

民国初年，双柏全县行政区域划分为十二个半营：

本城：辖云龙县城、冷水菁、新菴寺、乌龙寺等；

附郭：辖苏家屯、起木本、秧田冲、罗行山、挖铜村、妥梢、窝碑等；

妥上：辖妥甸、旧哨、海资底、六合等；

妥下：辖大麦地、大敌鲁、小敌鲁、坝冲、桂花井、长冲等；

乌上：辖法裱、杜近村、石头村、六街、铺司甸、浪泥圪等；

乌下：辖大庄、沙甸街、柏子村、代么古、麻栗树、郭三郎、尹代青等；

雨上：辖雨龙街、会房、英雄村、立德、法甸、郭三、野牛、厂街等；

雨下：辖格拉街、罗绍、田家村、木章郎、大、小黑泥等；

表上：辖独田、羊桥、毛铺子、马龙河等；

表下：辖旧关、六邦郎、中山、火把、蚂蚁堆等；

底上：辖底土、法念、河口、大麦地、芭蕉菁等；

里海：辖新街、油榨房、他得母、旧地基、安龙堡、柏家河等；

除以上十二个半营外，鄂加因地处偏僻，以石羊江为界，划作分县设一县佐，协助县公署办理一切事宜。

县城设一团保局于文昌宫内，设团总一人，总揽全县军事大权，如募兵、剿匪，并受理民刑诉讼，排解纠纷，协助县知事办理县政，各半营设立分团局于乡街重地，设分团首一人办理行政事宜，下设东、南、西、北四团，各设团长（或团总）一人及办事员若干人，接受上级命令协助办事。

民国时期封建地主和豪绅在双柏

的 统 治

郎 秀 才

清代末期，封建地主和豪绅，自上而下，操揽双柏一切大权。历代虽设有县官，也得听其行事，正所谓“强龙胜不过地头蛇”。据传民国初年，双柏县来了个姓商的县官，面对大权操在封建地主、豪绅之手，曾感慨地写道：“南安南安真难安（双柏前称“南安”），重重叠叠尽是山，佃户只服田主管，何必要我父母官”，以条幅出示于衙门口，后来，有百姓在东西两城门又贴出：“南安南安真难安，湾湾曲曲尽是山，佃户勉服田主官，只因遮民无清官”。虽属民间传闻的顺口溜，却道出了民国政府官员和地方豪绅尖锐的权利之争和贫苦大众盼望清官解脱枷锁的迫切愿望。

封建社会，有一整套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体制为其服务。在双柏亦不例外，一方是政府官的权力，一方是地主豪绅的权力。地方豪绅的权力，集中于县“团保局”，设“团总”，总揽全县年军，剿匪，民刑诉讼，排解纠纷，群众称之为“第一道衙门”，其权力之大，由此可知。

民国时期，双柏县妥甸丫口乡尹福国曾任县团保局团总，县以下的乌下地方（即今大庄）设“团分局”，下辖“四大绅团”，每团设“团管事”。大庄苏纶任乌下地方团分局“团总”，三槐庄王世昌任东团管